

短論·觀察·隨筆

# 香格里拉的政治價值

• 周 雷

西藏的「三一四」事件，實際上是認識論的一種分水嶺：如果視中國藏區為分立和具有獨特文化特性的分化個體，這種判斷錯了；從政治態度和宗教信仰的傳播說服角度來說，中國藏區作為一個信仰區域，它的複雜性被低估了，基層的藏族社會呈現了牢固的社會記憶、宗教皈依；論及中國政府針對藏區的政策體系和對外傳播體系時，單純的成就式宣傳和保守的傳播思維、定式和樣態，並不足以改變信息資源佔據優勢的國外受眾群體的態度。圍繞這許多問題，所有中國人應該追問：我們面臨着甚麼樣的西藏？我們身邊的藏族同胞在宗教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上到底是何種樣貌？

在國際社會輿論的壓力下，中國政府多少顯得被動。公正地說，中國政府的治藏政策絕非外國媒體評論的那麼糟糕。面對具有悠遠傳統、複雜歷史的西藏問題，任何政府都無法在各方面做到盡善盡美。回到最根本的問題，假設中國藏區的治理存在問題，真正內核的問題何在？是否存在

一個新的視角和思維，可以去除思想的遮蔽？

筆者曾經多次前往雲南迪慶藏區，也在近三個月之中，曾經沿着著名的茶馬古道，從西雙版納一路驅車抵達拉薩，從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區域，沿途對當地民眾和官員進行訪談。其中有些調研屬於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下文的討論實際上是試圖以雲南藏區作案例研究，對中國藏區存在的整體性問題進行考察，拋開對藏區經濟社會發展定量統計的爭論（因為在同樣的數字面前，有人理解為建設，有人則理解成破壞），單純檢討政策的戰略性、傳播的有效性，思考中國藏區在維護穩定、民族團結、經濟發展方面新的戰略視角和發展可能。

## 一 對中國藏區政治情勢的基本判斷：民族志視角

從民族認同、大眾傳播、政治修辭三個方面，筆者對中國藏區存在如下的基本判斷：

(一) 在民族認同的深層，廣大藏區仍然存在一個牢固而具有懷舊色彩的民族認同信仰體系，在家族觀、生死觀、宗教觀、價值觀等諸多方面，藏區的基層藏族同胞仍然維持着舊有的宗教形態和精神樣貌。雖然通過多年以來的基層政治民主、政治動員、政治控制、政治宣傳、文化發展、經濟發展、旅遊推廣等努力，廣大藏區體現了主流政治觀點所理解的「歸順」和「漢化」，但是在文化的深層，這些變化是否真實是十分可疑的。從基層藏族百姓的宗教信奉、信仰歸屬、宗教飾品佩戴、以「轉山」為主要形式的宗教實踐、以水葬和天葬為核心的藏族傳統生死觀皈依、藏族本土的宗教知識和宗教生活史等多個方面，中國藏區至少在微觀層面仍然維持着一個傳統的、以達賴喇嘛教義為核心的宗教信仰世系和宗教生活秩序。筆者在調查中了解的諸多案例，揭示如下事實：(1) 某些基層藏族百姓以收藏達賴喇嘛的物質寄託為榮；(2) 一些人奉印度的藏傳佛教為文化之宗；(3) 少部分區域甚至推崇印度式的生活方式，前往印度的民間朝聖活動持續不斷；(4) 有關宗教的民間敘述和本土知識與傳統的藏傳佛教關聯緊密。

必須認識到，只有在彼岸世界被「漢化」，才能被認定為真正的「漢化」和「歸順」；民間宗教記憶的堅固性絕非一般主流政治觀點所認識的那麼簡單。迪慶德欽縣雲嶺鄉多個村寨的個人生活史證實，圍繞着藏族神山的「轉山」實踐和民間群體的宗教記憶，是宗教影響剛性約束力的真正體現。基層的藏族百姓也許會基於生計考慮，在民族認同、意見表達和宗教表述上選擇一種主流敘述，但是在文化

方面，特別是民族記憶的深層，仍然把彼岸世界交予達賴喇嘛統治的宗教世界，這種文化、宗教、精神慣性是一種事實。一位受訪者說，他在多次「轉山」中做的事情，就是沿路唸經，向達賴喇嘛道歉，懇求原諒他在現實生活中的口是心非。當我們意識到這種基於個體的宗教實踐在人群中並非孤立和偶然的現象時，真實的宗教認同便昭然若揭<sup>①</sup>。

(二) 在政治影響傳播方面，中國藏區在傳播物質基礎上表現出薄弱、片段化和破碎化的樣態。以迪慶為例，真正的大眾傳播所依賴的廣播覆蓋、電視信號和網絡聯繫，在農村社區十分薄弱，基層的藏族百姓仍然依靠人際傳播來獲得有效的溝通，特別是有關宗教和信仰方面的溝通。一方面，筆者看到，基於社區和農村的政治痕迹和影響明顯，政治意見和態度的傳達直接且多元；另一方面，真正影響基層藏區百姓態度、行為和思維的有效傳播，並非來自大眾傳播媒介和官方主導的政治傳播，而是來自民間的「火塘」和「酒精」，在無數的小規模聚會和民間活動中完成。中國自上而下、去除個性、政治色彩濃重、行政色彩過強的傳播和宗教管理，對於民族多元、文化複雜、宗教影響深巨的藏區有時是低效的<sup>②</sup>。

(三) 從政治修辭來看，達賴喇嘛以及國際社會所響應的是一套人際、人文、民本的修辭系統，在他們的傳播、對話、表述系統中，時常出現的是普世且關乎個體福祉的詞彙，如民主、自由、家園、故國、人的尊嚴、生活的詩性、寬容、愛等具有蠱惑力的詞彙；與之對比，在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對中國藏區的政治修辭是現實的、政治的、功利的、定量

的，學者往往習慣用政治話語來描述宗教性、文學性、意識形態性的現實。中國政府的相關政治敘述，時常是一種單純的否定和辱罵，並把這個事實在民間某些群體中仍然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領袖無限貶低，使用充滿政治正確性和紅衛兵式的政治話語；缺乏有效的智慧使用藏傳佛教佛經和普世價值來與國際上的不同政見進行真正的辯論和回應。這種修辭上的誤置使得中國政府的許多成績被掩蓋、對外政治形象遭到損壞、政治智慧遭到質疑。只有將這種與達賴喇嘛的論爭還原為宗教性、人性、文明性、修辭性的論戰，才能破解目下的傳播弱勢，用政府的倫理性和文明性來消弭謊言和污蔑。

## 二 反思藏區的政治傳播： 優化的可能性何在？

任何對中國藏區的討論，均無法脫離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中央政府長期以來將以拉薩為中心的「核心藏區」視為宣傳和政策扶持的中心，從整個政策體系上來說，是圍繞着達賴喇嘛所集中宣傳和攻擊的問題開展工作。雖然一直以來中央政府做了許多工作，各級政府在支援藏區建設方面表達了充分的誠意、願力和努力，在藏區經濟、政治、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出台了諸多利好政策，辦了不少實事，完成許多標誌性工程，但從此次「三一四」國際排華浪潮中可以看出，以上的功績並沒有得到廣泛認同，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同時「選擇性失明」，對中國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銳批評，中國政府的開發、開放、開明往往被境外人士污蔑為所謂

的無神論、專制政體對西藏文化的系統破壞。

在西方人士眼中，達賴喇嘛的精神體系和政策策略是精神性的、神性的、倫理的、道德的，他對宗教自由和精神信仰的終極追求，得到最廣泛的認同（從國際社會賦予他的各種榮譽稱號也可以看出）。他建立的一套對傳統西藏社會帶詩意、烏托邦色彩的描述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也處在西方政治視覺的中央。達賴喇嘛的政治催眠迎合了國際社會的想像，從潛意識層面激發了西方人夢境式想像中國和西藏的能力。

達賴喇嘛曾經在1995年在美國波士頓與中國學生對話時，提到「喇嘛教的信仰將給漢人社會帶來幸福與和平」；到目前為止，十四世達賴喇嘛公開主持《時論經》灌頂儀式不下二十五次，從印度、美國，到蒙古、澳大利亞。不管中國官方系統如何認知，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喇嘛教教眾和非教眾身份的親善者眼中，都是具有道德親和力、不斷給予的精神性人物，他也正是通過這種無形的能力來向有形的社會，特別是漢人社會來行使他的權力和影響，當中國多個藏區在「三一四」事件中同時響應時，可以明顯感覺到其延展至末梢神經的影響力，在信息傳播角度頗為封閉的西南中國瞬間形成高效的動員<sup>③</sup>。

從這種角度來說，中國政府面對的是「水流式」的傳播體系，其中教義來自頂端，精神和心靈是介質，語言是聯絡的電流。從隱喻的層面來說，教眾的身體是調適靈敏的媒材，當四周出現來自接受頻率內部的信號，便會立刻在教眾和民眾構成的感應介質中傳播，形成迴響。在田野調查中，

筆者發現一些藏區年輕人有一種特殊書寫習慣，他們可以用漢字表達只有藏族、納西族、傈僳族能理解的信息，惟獨對漢人來說是一組亂碼。假設這種傳播模式是一種心靈和精神的巴別塔，它所激發的傳播效果將是多麼驚人。雖然作為文化的他者，可以覺察到中國藏區語言的不相通融性，藏語也因此被分成不可互相理解的語系，但是由於精神信仰、地理聯繫、族群認同的趨同性和內在整合力量，有時正好可以利用彼此對漢族社會普通話的基本理解，用一種客體和他者的語言，進行加密傳播，穿越重山的阻隔。

作為對比，政府官方系統的動員、應急、宣傳體系是箭垛式的、「盾」型思維、格式塔式的，它遠遠沒有做到基於社區、基層的信息理解，其表達形式和信息採集方式是粗放和行政化的，並且主要依靠語言傳遞。而針對特殊時期和特殊理解對象，依靠語言傳播態度和事實往往是最不可靠的。正如人類學學科訓練的基本要求所說，如果沒有在田野積累足夠時間，掌握研究對象的語言，了解其日常生活，所有框架式訪談搜集的信息均是偽信息，因為它悖離了信息的原意——它不是減少不確定性，而是增加不確定性。

如果將中國政府針對中國藏區治理的幾十年假設性地壓縮成一個小時和一個傳播環形，在這個小時內，多少分鐘是信息的輸出？多少分鐘是信息的輸入？多少分鐘在檢查效果？如果在「誰」→「通過甚麼」→「向誰」→「說了甚麼」→「產生了甚麼效果」這個傳播環形中，「說了甚麼」這個單一環節佔據了50分鐘，能否說明這是一種

有效傳播？中文裏「連篇累牘」這個詞是否表達了一種傳播學上的負面效果？無論作為個人、集體，還是更大的概念的「國家」，要進行真正有效的宣傳和傳播也需要像流水一樣經過上述所有環節，其中的過程不可省略。設想一下，要是現有的傳播和宣傳可以陳列出同樣厚度的關於「誰」、「向誰」和「產生了甚麼效果」的成就，而非有關自己「說了甚麼」的結果，傳播的效果將有天壤之別。

因此，圍繞這類問題，如果中央政府沒有更好的策略和理論體系，就無法真正解釋國際傳播語境中的誤解和誤讀，褪去對方的鋒芒。這就是為甚麼在任何有關西藏的政治動蕩發生之後，中國政府系統的專家、藏學家、藏族學者出來說話，(坦白而言，儘管陳列的也是事實)往往在國際社會沒有可信度。因為，他們仍然在糾纏於「說了甚麼」這一環節，試圖用定量的數據解釋定性的事理。同時，相比較達賴喇嘛在西方人眼中所理解的世系上的純正和精神信仰等級，這些駁斥和論述是非主流的、政府化的、宣傳化的、意識形態的，也就是處在不同的播出頻率，不具有交叉影響的能力。

所以，中國政府應該從體系上重新建立一種傳播和溝通體系，迪慶藏區的香格里拉正是個突破點——通過現行話語系統的「邊緣藏區文化」來消解「核心藏區」的政治威懾力。通過將迪慶藏區打造成與西方意識形態對話的前台、新西藏文化的典型、新西藏信仰自由展示中心、藏式國際生態示範區、藏式文化保存實驗區，搭建實體性的傳播平台來進行真實而非虛擬的論戰。

### 三 如何構建新的「邊緣中心」？：香格里拉的政治可能

當置於西藏整個歷史空間中，迪慶藏區的確佔有獨特的地位，但就目前的對話場域地位來說，它是典型的邊緣化地區。然而，事實上，正是這片區域存在如下「自然」和「精神」的優勢，使它可以在藏區文化的世系中獲得一種「根」和「本」的地位。

第一為生態。滇西北、三江並流一直是國際焦點的焦點，它的生態意義、政治示範意義即使放在整個西藏核心藏區和中央政府的政策組合裏，都具有核心意義和權威地位的潛力。中國政府應該將迪慶藏區打造成具有全球意義的生態方舟和新藏區政治文明的橋頭堡，用一種融合了當地文化、宗教、歷史遺產的方式，使之在國際輿論中具有強效的說服力，得以證明中國政府政治的生態性、文明性。迪慶藏區目前為解決經濟發展問題，不得不將礦業、水電、旅遊、生態、生物資源等具有內在矛盾性的產

業並列和同時開發，也由此屢次遭到國際社會的質疑和攻擊。而一旦構建新藏區文化、新藏區政治文明的生態策略被認定為國家策略，香格里拉將因此獲得更多面向生態領域和文化領域的國家支持，得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生態方舟，在無需縮減三江並流世界自然遺產面積和犧牲迪慶藏族及其他民族福祉的前提下，開始更為全面的生態文明建設，構建中國政府治下的新藏區政治文明和生態文明④。

第二為宗教。作為卡瓦格博神山所在地，迪慶藏區在宗教世系上也有一種無法替代、可與核心藏區匹敵的宗教合法性和權威性。迪慶藏區可以因此成為新藏區宗教文明的另一個中心，向國際社會傳達一種真正開放、和諧、共生、神性的宗教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與國際社會形成積極有效的溝通。結合三江並流的生態性和藏族神山外「轉山」的宗教神聖性，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現代的宗教信仰生活體系；保護寬容和真正的藏區文化精神、宗教精神，營造一個藏傳佛教諸神的居所，這兩個關於生態和神性

松贊林寺是雲南藏區的著名旅遊景點



的構建，可以使得中國政府擁有一個新的具有核心對話力的傳播場域。

第三為香格里拉。以往的香格里拉宣傳屬於旅遊、經濟、文化意義的狹義宣傳，而這個概念的真正魅力和價值其實可以是作為一種新政治文化、宗教文化、經濟文化的可能性。關鍵在於，這種表述必須要是詩性的、宗教的、倫理的、道德的，和達賴喇嘛宣傳的核心教義一樣。只有用對等的策略、修辭級別和敘事體去宣傳，才能獲得最大的效果。香格里拉傳達的政治詩意和文明性可以消解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諸多誤解。只有將藏區設置成地域的、文化的、宗教的、信仰的、世系的多中心，才能真正消弭現實的矛盾。這些是屬於政治文明的智慧，是「矛」的智慧；而非簡單的應對策略，和「盾」的守備觀念。

通過構建中國廣大「邊緣藏區」的和諧場域，描摹出新藏區文化、新藏區政治文明、新藏區生態文明、意識形態國際對話平台的政策實施細節，在實踐中重新尋找例證並建立政府治理的方法論體系，這可能是一種新的可能性。

### 註釋

① 除了參閱四川省民族事務委員會編的《四川藏傳佛教調查研究叢書之一：藏傳佛教寺院資料選編》（內部資料，1989）和《四川藏傳佛教調查研究叢書之二：宗教政策文件及研究論文、報告選編》（內部資料，1993）之外，本文對藏傳佛教的整體判斷主要依靠筆者對雲南藏區的六次田野考察，歷時共兩個月。此外在2005年9月，筆者驅車從西雙版納至拉薩進行宗教人類學考察，耗時近三個月。

② 在迪慶藏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雲南省社科院宗教所編撰的《迪慶州宗教志》（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一書中，多次提到了迪慶宗教在整個藏區的特殊歷史地位和世系地位。在現實中可以發現，雲南藏區相比較中國其他藏區，已經顯現出較為明顯的「恭順」——近期發生在中國其他藏區的數次動亂中，雲南藏區在外表上只是出現些許「漣漪」。但是應該注意到，來自民間的個人口述史證實，在宗教認同的民族意識深層，雲南藏區並沒有外表上的寧靜。發生在此地的宗教與政治傳播仍然可以用來推斷其他藏區的現實情勢。

③ 在黃豆米：《聖地遊戲——梅里雪山徒步外轉》（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以及斯那都居、扎西鄧珠：《聖地卡瓦格博秘籍》（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2007）二書中，作者在某種程度上都在進行一種神聖化的書寫嘗試，並試圖用作者的生命經驗直接影響更為廣大的讀者群體。從這類書籍在遊客及自我放逐的城市群體中的影響和風行程度來看，正是波及「神經末梢」的傳播嘗試。通過網絡的同儕群體和「博客」空間，這種泛神論和神秘主義的敘述，形成了更為廣泛的俗世討論和現實迴響。

④ 在德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的《德欽縣志》（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7）一書中，作者描述當地的政府系統執著於一種當地的現代想像，流露在筆端的情緒和願景都是為把德欽發展成一個旅遊、礦產、水電意義上的現代型社會。新農村建設、興邊富民、民族繁榮和民族團結這類政治口號，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一種現實經濟開發的「魔法鑰匙」。正如當地官員時常說的一句話：民族地區的發展不是個經濟問題，更多是個政治問題，關乎國家及民族統一的大局問題。

周 雷 雲南大學民族研究院人類學  
博士研究生